

数字资本主义生命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朱 忆 天 秦 瑞 聪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勾连深刻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范式和生活形态,也催生了生命异化的新型表现形式。时间、空间和主体性为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异化本质提供了重要分析维度,并清晰地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类生命的全面支配。在时间维度上,资本借助数字技术模糊生产与生活的边界,将个体生命时间全域纳入价值增值链条。在空间维度上,数字平台的全域渗透将个体生存空间重构为潜在劳动场域,拓展资本空间体系。在主体性维度上,资本借助算法实现了个体的可计算化,造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凸显的生命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数字技术的耦合,不仅使技术理性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性力量,而且致使人类生命被还原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生产要素,使个体生命逻辑受制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为此,亟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审视技术与生命逻辑之间的内在关系,透过数字技术的中立性表象,揭示其背后的资本剥削本质。同时,以社会主义制度规范资本运行,实现从资本逻辑向劳动逻辑的转变,以真正的共同体扬弃生命的全面异化。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生命异化;算法治理;数字劳动;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F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3-0016-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302

一、问题提出与学术研究进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资本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数字资本主义“以数据、算法、平台和网络为关键生产要素,重构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行逻辑,通过数据商品化、平台垄断和算法控制实现资本增殖的全球化积累”^[1]。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了资本每时每刻都在对个体价值进行剥削,“当资本主义在传统物理疆域及实体市场的扩张接近饱和之后,它的积累逻辑便开始转向一个新的领域,将人类的社会交往、心智以及行为本身,当作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2]。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对个体生命的支配已突破劳动时间的延长,它借助智能设备和算法技术的渗透将人们的社交、情感乃至睡眠等原本被视为非生产性的生活领域纳入资本增殖体系中。基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生命异化现象的解读,延续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学术界围绕“数字资本主义生命异化”的重要论述,从多维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26-02-26

作者简介:朱忆天,男,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明与社会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资本观研究”(24CKS026)。

一是从劳动异化的视角出发,聚焦“劳动”作为异化的核心载体,从劳动本质、劳动过程、劳动成果三个维度,阐释数字时代异化的延续与升级,强调资本增殖逻辑对个体生命活动的剥削与价值吸纳。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提出生命活动异化、类本质异化,奠定了生命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根基。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而资本主义使生命活动沦为谋生手段,导致生命异化为“非人”的状态^[3]。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延续劳动异化逻辑,围绕“劳动—资本”的关系提出数字劳动理论,侧重“无酬劳动剥削”。他指出资本将用户日常生命活动转化为无酬数字劳动,对个体生命时间进行全域剥削,由此完成对社会生命的实质性吸纳^[4]。基于此,国内学者在探讨生命异化的过程中强调资本权力的作用,认为“资本权力已经构成生命政治之暗面潜藏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它隐秘地‘施暴’于活生生的生命来实现自身的无限增殖”^[5]。同时有学者认为:“生命异化只是数字资本主义下主体数字化生存的日常生活表现,而非本质原因。”^[6]指出在生命异化与劳动异化的背后发挥作用的依然是资本与政治、资本与技术的勾连,这直击生命异化的根本原因。在生命全域异化层面,数字资本将生命活动全面纳入价值增殖链条,使传统劳动异化进一步升级为生命全域异化,呈现出隐蔽化、全域化与常态化的典型特征^[6]。

二是从权力规训视角,重点阐释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如何异化为权力的工具,实现对个体生命的全域规训。首先,福柯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将生命政治定义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7]242}。福柯从技术对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操控的角度对生命政治理论深入阐发,深刻揭示了现代权力对身体层面的微观规训机制,将社会成员塑造为符合标准化、理性化要求的治理人口^[8]。尽管阿甘本反对福柯的“生命政治仅仅是现代产物”的观点,但他通过“赤裸生命”的概念,提出“主权通过排除边缘群体为自身奠基”^[9],开辟了“生命—权力”批判传统。从经典权力批判延伸至技术权力批判,马尔库塞侧重“技术统治”,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借助技术理性和虚假需求,将技术的合理性演变为统治的合理性,技术进步消解了人的批判性、否定性维度,使人成为顺从体制的“单向度的人”^[10]。当代学者韩炳哲将“生命政治”延伸至“精神政治”,在以非物质生产为主要手段的数字化社会中,从精神政治的角度考察数字化时代主体生存状态,阐释了社会规范对个体内在生命的规训^[11]。在算法权力异化层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算法权力成为更为隐蔽的监控力量,从算法技术对生命全域规训的角度揭示个体生命自主性不断消解是数字时代的新课题^[12]。

三是从人本主义立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生存状态,聚焦个体日常生命中的变化,跳出劳动、技术的单一维度,从人的整体存在出发,阐释数字时代个体生命如何被工具化,其存在意义如何被消解。列斐伏尔早中期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对象的转向,将日常生活引入研究视域,将人类解放聚焦到日常生活的微观场域^[13]。“将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人的整体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实现”^[14]。又如,“弗洛姆创造性地融合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社会性格’为核心理论架构,结合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心理机制揭示异化形成的内在逻辑”^[6]。社会对工业发展的过度关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束缚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四是从数据商品化的视角,强调数字平台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利润空间,将个体生命活动、数据、日常生活等转化为商品。数字平台作为数据商品化的核心,有学者指出,“资本逻辑不可避免地内生并深嵌于网络、终端、算法、数据等一切架构平台技术的意向结构,设计和操控人的活动”,不断生成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模式和操控向度^[16]。然而,在数字平台上,任何商品都必须转化为数据,才能在数字空间流通和交换^[17]。数据由此成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资本为了获取更多数据,只能不断延长获取数据的时空维度。肖莎娜·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一书引发了人们对以下事实的广

泛关注:“不断兴起的新型数字技术不仅为我们服务,还监控着甚至想方设法操控我们的行为,以获取可供资本增殖的数据资源。”^[18]基于此,有学者在论述数字监控资本主义时指出,这使得个体劳动过程中的时间、空间无限延展,同时劳动过程监控更加隐蔽^[19],资本由此不断扩展劳动异化的维度,不断拓展资本增殖的空间。以国外左翼为代表的研究者进一步从生物资本主义视角指出,资本已渗透生命存续全过程,工作与休闲的边界趋于消解,生命本身直接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来源^[20]。

综上所述,虽然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劳动异化、生命政治和技术权力等问题,但较少有研究从“时间、空间、主体性”三个维度整合性地界定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生命异化。本文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生命异化是指在数字资本逻辑驱动下,通过数字技术对人类生命进行全面渗透和控制,导致个体在时间、空间和主体性维度上的内在生命活动、本质属性和自由自觉发展被工具化、商品化,最终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对象的状态。“我们可以将这一次价值形式的重组称为剩余价值的生命政治重组,因为资本直接博弈和收割的对象,就是普通人的生物性生命。”^[21]为此,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命异化,并考察对象从生产性劳动拓展至生命本身,这种异化不仅是传统劳动异化的延续和升级,更表现出全域化、隐蔽化和常态化的新特征。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异化及其缘由

马克思所揭示的大工业工厂这一历史条件下工人的异化,无疑对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生命异化具有启示作用。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将原本处于传统生产领域之外的社交、睡眠与情感等生命活动纳入价值增殖的体系中,同时,以工厂为中心的时空结构也被重构。为此,需要从时间、空间与主体性三维度考察异化逻辑从单一的生产领域向人的全生命过程的扩展,并揭示其演进机制。

(一) 数字资本主义对时间的盘剥:从“工作时间”到“生命时间”的殖民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22]⁷⁰“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22]⁷⁰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时间的占有主要体现为对工作日的争夺,资本家在工厂这一相对封闭的场所内,尽可能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但是,以场所为中心的劳动吸纳方式往往会受到工人生理极限与场域的物理围墙的双重制约,工人们的劳动与闲暇时间拥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边界。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借助数字技术使剩余价值的生产不需要完全依赖固定的工作场所,智能设备成为资本全天候占有剩余价值的移动终端,为资本持续占有剩余价值提供社会基础。“对于24/7的资本主义的完全实现而言,睡眠是仅存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它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种‘自然障碍’。”^[23]²²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借助算法推荐系统与持续连接的媒介环境,塑造出了一种持续运转的注意力经济,主体被卷入持续在线的待机状态。“睡眠无法被彻底取消,但是可以被破坏、被缩短、被剥夺,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侵占睡眠的装置、动机都已具备。”^[24]

当时间越来越多地被数字装置度量、记录并纳入可计算的框架时,人的日常时间感与生活节奏也随之被重塑,主体生存状态容易滑向被动、反应式的“在线应答”。时间作为人的本质性存在维度,既是生命存续的度量依据,也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场域。数字装置对时间的占有,其后果并不局限于剩余价值的增加,更会引发生命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损耗,导致个体自身及其与世界建立深刻联系的能力被削弱,生命活动被压缩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时间不是为生命展开的内在空间,更像是被经济活动填充、绩效逻辑切割的容器。资本将个体的在时性转译为可度量、可存储、可分析的数据流,突破了劳动

时间的物理、生理与制度层面的界限,把原本处于资本循环之外的生命活动纳入剩余价值的体系。由此,主体时间维度的异化绝非偶然现象,这标志着资本对人的支配由局部的劳动时间异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完整生命周期的生命异化,使个体的生命节律完全受制于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

(二) 数字资本主义对空间的钳制:从“物理空间”到“生存空间”的宰制

空间并非中立的容器,而是由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范畴。更直接地说,“(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5]40}。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借助平台、数据与算法把原本相对稳定且独立的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重新组织起来。以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数字装置提高了劳动的可移动性,打破了工业时代工厂与住宅空间的二元分割。表面上,数字技术似乎扩大了劳动者对工作地点的选择,但是空间的“可移动”同时意味着空间边界的弱化,只要保持在线连接,家庭、咖啡馆甚至度假地等都可能被即时转化为工作场所。资本无需增加更多的直接投入,却持续激发劳动力的自我投入,使劳动者陷入随时待命的强制状态。然而,数字资本对空间的殖民远不止于工作场所的无限外延,更在于对个体私密生活领域的深度攫取。在无墙的规训场域中,资本为发掘更多可被利用的价值,鼓励人们主动展示日常生活、情感状态与消费偏好,以换取社交资本与平台认可。这一过程实质上是资本将传统的非生产性生活空间强行拉入公共经济空间的轨道,使个体生命成为资本开采数据的原料。

资本之所以关注空间,并不是为了占有某个地点,而是为了组织、控制劳动的发生条件,以便更有效地攫取剩余价值。数字资本对空间的殖民以数字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为前提,将数字空间塑造为数字资本主义实施扩张的新型场域,通过隐蔽方式对数字个体进行全方位的价值观念渗透与思想规训^[26]。“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27]216}一旦劳动者进入资本雇佣关系,其生产与生活便被纳入资本主义空间体系,相关空间权益也随之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28]。资本为发掘更多可被利用的价值,鼓励人们主动展示自我,这就致使了由隐私铸就的边界不断遭受侵蚀。资本权力结构本身不可见,但主体却处于最大的可见性之中,使得个体即使无法确定监视者是谁,也会持续进行自我审查与自我规训。因此,数字时代公私空间界限的彻底瓦解是个体生存空间的本质性沦陷。个体在其中的自由行动、私人交往乃至最隐秘的生活细节,都被无孔不入的数字装置转译为资本增殖的空间要素。生命在无所遁形的全域空间中深刻体验着存在的异化。

(三) 数字资本主义对主体性的消解:从“完整的人”到“可计算的虚体”

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主体内在的生命体验转译为外在的数据表征,即个体存在状态被全面量化。资本借助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移动支付与社交媒体的全面普及,将原本不可见、不可交换的感受、习惯与偏好,转化为可分析、可存储、可运算的数据形式,主体的生命被完整地数据化呈现。然而,算法权力不同于福柯所描述的以否定性禁令为特征的规训权力,它摒弃了权力本身的内在否定性,装扮成自由。如果说福柯的规训是通过纪律强化对生命的支配的话,那么后继规训机制的有效性就体现在削弱被支配者对外在强制的感知。长期处于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个体丧失的不仅是批判能力,更是自我生命建构的独立性。在资本所建构的个性化定制范式与虚假自由幻象裹挟之下,个体主动让渡自身隐私边界、本能欲望与生命体验,将自我规训、自我优化的生存实践异化为向资本平台持续地供给数据。资本无须外在强制,就能实现对主体资源的深度动员。这并不单纯是技术的副效应,而是数字资本进入生命领域后带来的必然结果。

数字化的行为习惯,准确地描摹出主体外在行为和内心情感图像,这比主体的自我画像要更加全面、准确^{[29]19}。这一过程表面是为了提升自我管理 with 认知能力,实质是主体经验以大规模、连续性的方式转化为可被资本调用、分析和利用的数据资源,从而使资本具备预测、干预和实现价值的能力。一个现实独立的个体,其欲望并非完全理性,也不是线性且可预测的。因此,主体欲望的不确定性是资本增

殖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算法通过对个体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构建极其精准的预测模型,它可以比主体自身更早地捕捉主体的偏好变化,并以个性化服务的方式将最符合主体偏好、同时也最有利于资本增殖的内容推送至主体面前。在此机制下,数字资本对人的主体性剥夺,不再局限于对肉体体力的直接榨取,而是从存在层面消解了生命本有的不确定性与感性深度。人的本真生命体验被算法的功利逻辑全面降维,且被拆解重构为由标签、代码、行为概率构成的可计算数字虚体。至此,个体生命逻辑彻底从属于资本增殖逻辑,生命异化在主体维度完成了最深层的闭环。

三、数字资本主义生命异化的理论剖析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批判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生命异化,关键在于深刻把握其本质根源是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内在逻辑与根本目的。尽管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转型改变了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但数字技术并未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逻辑裹挟数字技术对个体生命进行深度剥削。为此,需从资本逻辑、数字劳动与算法治理三个维度剖析数字资本主义对主体生命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

(一) 根本动因:资本逻辑的增殖悖论

资本逻辑的核心是无休止的自我增殖与剩余价值的攫取,这是资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30]922} 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驱动力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命异化最深层次的生成逻辑。在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支配下,资本增殖始终以对劳动力的持续汲取为基础,而这种汲取在现实运动中必然遭遇来自生命本身的双重刚性约束。一方面,劳动者作为肉体存在所具有的生物学边界,构成资本无法逾越的自然限度。另一方面,工作日与生命时间的客观有限性,使得传统生产领域内的剩余价值榨取存在不可突破的上限。当物质生产领域的市场饱和、产能过剩与利润率下降趋势叠加,资本在传统生产空间中的扩张便抵达其现实边界,陷入积累困境与增殖危机。因此,数字资本并非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偶然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数字时代向新的生产要素和社会领域延展的必然。随着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进一步升级,其积累逻辑不再局限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对雇佣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而是进一步扩张为对人类整体生存状态的全域吸纳,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资本化。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从来不是全盘否定资本,而是辩证看待。资本在人类社会从封建时代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革命性功能。作为生产要素,数字资本天然具有推动技术迭代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功能,但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垄断决定了资本增殖逻辑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统治权,致使资本必然越界并导致生命异化的极端化。反观当下的国内现实生活,尽管我们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外卖骑手的“算法困境”、社交媒体的“注意力收割”与职场群聊引发的“时空压缩”等异化表象,印证了数字资本在逐利本性驱动下自发向生命领域渗透的冲动。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运行并非盲目无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公有制为主体的底线逻辑与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治理架构,着力剥离资本的资本主义剥削属性。这意味着,生命异化并非数字技术发展的绝对宿命,而是数字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有产物。资本为追求无限增殖将个体生命活动纳入资本增殖逻辑框架中,无视个体生命的内在发展规律,奠定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命异化的社会基础,最终造就当代社会生命异化的现实图景。

(二) 实践载体:数字劳动的异化展开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劳动形态由传统工业劳动向数字劳动转型,突破了传统劳动在时空、主

体、内容上的固有边界,将劳动场域从工厂内部延伸至社会生活全域,将劳动主体从正式雇佣劳动者拓展至全体数字用户,将劳动内容从物质生产拓展至认知、情感、社交等非物质生产领域。在网络空间中,数字用户的身份更多体现为数字消费者,而非单纯的数字劳动者,各类数字广告则成为连接数字销售与数字消费行为的重要纽带^[31]。数字劳动以“非物质劳动”形态嵌入到日常生活中,不仅限于明确指派的工作任务,劳动者在浏览信息、点击链接、发表评论和分享内容等日常行为中持续生成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源被平台资本不断整合、提取与分析,进而转化为资本增殖的核心要素。数字劳动的嵌入并非偶然,它是平台借助界面设计、功能配置和交互机制,有意将用户的参与行为转化为稳定的数据供给,使大量原本不被视为劳动的活动纳入资本积累的运行轨道,从而形成“产消合一”的劳动形态。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数字劳动使得一般数据的生成和积累成为可能,而这些数据的资本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家的权力,由此形成了一个资本循环积累的过程^[32]。资本通过控制数字平台等方式,获取在数字生产中的主导权,实现对参与者的全天候控制。数字劳动往往以自由参与、娱乐体验或社交互动的形式展现,在表象层面弱化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关系,使主体容易将自身的投入理解为自愿行为,而非劳动过程的一部分。“信息茧房”和智能推荐等技术将资本无限增殖的目标悄然转化为个体的“自我需求”,实现了对劳动者从外部支配到内在驱动的转化。“数字时代劳动者的一切生命情感都被资本所掌控,各种数字平台表面上以情感共鸣获取受众,实际是在制造自我情感剥削需求。”^[33]数字劳动者在无意识的状态中被资本剥削,甚至会自发地认同资本看似“自由”的运转逻辑。当数字劳动日趋常态化,生命便被纳入价值计算的框架。个体在虚拟空间的大量重复性操作,使个体能动性不断被压缩为对平台规则的被动回应行为。劳动不再是主体自我实现的活动,而是被动维系系统运转的数据供给过程。因此,数字劳动不仅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且也推动了异化从劳动领域向生命整体的外溢。

(三) 技术赋能:算法理性的规训宰制

“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27]508} 技术不是天然具有剥削性,其呈现出的控制功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技术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必然会逻辑映射到其现代化进程上”^[34]。为了实现对人的可预测、可调度与可管理,数字技术从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转变为用于组织劳动过程、引导消费选择甚至协调社会运行的基础机制。算法将劳动者的思维轨迹转化为可预测的认知图谱,“信息茧房”使主体认知范围被资本预设的圈层限定。劳动者从独立思考的主体退化为按数据指令行动的执行者,思维方式的多元性被算法的单一功利逻辑所统摄^[35]。因此,在算法的主导下,个体表面看似拥有自主决策的权利,但其所能接触的信息范畴、各类选项的展示次序,乃至相关的反馈机制,已被技术系统提前设定,部分行动路径变得更为突出、易操作,而其他选择被边缘化。

技术要素并非天然具备资本属性,一旦置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就会转化为资本,同理,只有当数据被资本系统性掌控、加工,并运用于生产组织与市场运作时,才会被赋予资本的特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掌握的特权,表现为技术巨头掌握的技术特权,这是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最新发展的现实表现。”^[36]云计算与大数据分析应用时常被用于预判市场走势与塑造主体消费偏好,使得数据成为资本增殖过程中施展支配性权力的关键依托,成为参与价值形成过程的重要因素。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行为痕迹、情感反应与社会互动在平台的整合与算法处理下被转化为用于预测、干预和调度社会行为的资源,这些数据本身并不等同于价值,但其经过处理后可以成为资本增殖的要素。数字技术被资本逻辑裹挟,演变为带有控制倾向的技术形态,其运行旨在更高效地配合资本对各类社会活动的全局调配。因此,数字技术的异化不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资本在数字条件下调整对个体控制方式的体

现。这种控制逻辑,通过时间、空间与主体的异化,为资本主义构筑起稳定且持久的技术支撑。

四、数字资本主义生命异化的应对之路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使生命置身于赛博空间中,一切主体活动都可以借助数据信息进行展示、联结、再现。因此,为了扬弃资本逻辑的束缚,必须探索打破数字资本私有垄断、实现共享的制度,同时突破资本逻辑桎梏、重塑人的劳动价值逻辑,通过构建真正的劳动共同体复归于生命的本真状态。

(一) 驾驭数字资本:以社会主义制度规范资本运行

资本主义剥削与异化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破解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生命异化,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资料使用权层面的共享,只要数据与平台的基础所有权未发生根本转移,任何形式的共享都无法超越私有垄断。因此,我们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根本上引导和驾驭数字资本的运行,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石。第一,辩证把握数字资本要素的二重属性。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发挥数字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更要防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倾向。我国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例如,针对社区团购赛道资本低价倾销挤压个体工商户的乱象,监管部门依据为资本设置的“红绿灯”规则叫停了资本非理性的烧钱扩张。此后,我国各职能部门后续围绕该项制度开展了多轮研讨,持续细化“绿灯”投资方向,优化落地细则,依托顶层设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第二,依托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捍卫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关键数字领域的压舱石作用。我国已建成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平台,由国有系统统筹建设各地政务数据资源库,社保、医保、不动产等公共数据归公共所有,免费向社会开放基础查询服务,以此杜绝私有平台囤积公共政务数据变现牟利的行为。第三,运用法律手段刚性划定数字资本运行边界,推动数字经济与国家战略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契合。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监管部门先后对阿里巴巴“二选一”垄断、美团在生鲜与外卖市场垄断作出高额行政处罚,整治平台利用算法、数据优势压榨商户与消费者以及大数据杀熟的乱象。与此同时,要深入贯彻落实《数据二十条》,在坚持国家数据主权与公共利益主导的前提下,探索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三权分置”^[37],将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转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坚实保障。

(二) 重塑价值尺度:实现从资本逻辑向劳动逻辑的转变

劳动是人自我实现与生命展开的现实基础,是个体全面发展和持续成长的根本路径。劳动逻辑既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本质的关键,也是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矛盾与悖论性贫困的核心路径^[38]。为此,要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确认劳动的最终导向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将资本规范在制度框架内,杜绝资本对劳动的无限制地支配。第一,要进一步探索以“属人优先”为原则的按劳分配机制,强化劳动价值的主导地位。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国家进一步优化了初次分配格局,以“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为导向,实现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在江苏、山东等地的制造业落实技高者多得的政策,改变了过去“资本拿大头、劳动拿底薪”的分配格局。同时,通过调整分配方式,利用资本扩大社会财富总量,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基础。第二,要将劳动的目的设定为实现人的能力发展与自我确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要促进高质量就业,并明确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要求。国家依托就业友好政策搭建了数字技能免费培训体系,面向农民工、失业群体开展AI运维、电商运营公益培训,从制度层

面杜绝资本借助技能门槛压榨底层劳动者的情况。第三,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劳动解放,拓展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近年来,各地区农户的生产方式从机械式体力劳动转向育种优化、数字化经营等模式,技术的赋能显著提升了农户的收益率和生活水平。因此,我们要进一步促进数字技术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紧密结合,利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促进生命多样性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以高质量的劳动创造驱动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劳动逻辑为价值导向,确认劳动者在数字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进一步夯实数字技术回归人本逻辑的基础,促进人的解放。

(三) 回归社会本质:以真正的共同体扬弃生命的全面异化

人的本质并非抽象地内在于个体,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9]571}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数字技术定位为社会联结的补充而非替代真实社会关系。第一,要依托现代化数字社会治理重塑真实的社会联结。部分商业平台依托大数据与算法垄断,一味追逐盈利,大数据杀熟、流量诱导消费等行为严重侵蚀日常邻里交往。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由地方政务牵头搭建了社区数字化便民公共平台,整合邻里互助等公共功能,有效弥补美团、抖音等市场化平台偏重商业变现、忽视邻里社交建设的短板,依托公共数字场景重构熟人社会联结,进而助于加强社会团结。由此可见,要通过制度规制锚定技术发展方向,让数字技术持续赋能良性社会联结,夯实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根基。第二,从制度、文化与实践三重维度不断强化公众共同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促使个体嵌入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40]因此,要培育具备数字主权意识的新型数字公民,引导社会公众认清算法背后的隐性规训机制,在合理享用数字化生活红利的同时,理性甄别平台隐蔽化的资本剥削行为,致力于将普通消费者转化为数字治理的参与主体,在公共实践中树立数字主权意识。第三,强化科技向善的伦理导向,分层推进国内网络治理与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国内层面,必须强化数字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将网络平台的“清朗”行动常态化,守护网民身心健康,防范平台滥用算法与数据监视用户的不当行为。国际层面,我国牵头推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反对个别国家依托技术优势实施数据单边管控、数字封锁,依托多边合作推进跨境数据普惠治理,以合作共建抵御全球范围的数字资本霸权。从全球层面推动共建包容普惠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从内外两个维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破除制度与技术壁垒。

[参 考 文 献]

- [1] 贾淑品. 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本质及趋势[J]. 当代世界, 2025(10): 48-54.
- [2] 魏士国. 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数字治理的分野[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11): 101-108, 119.
- [3] 王峰明, 王叔君. “生命异化”还是“劳动异化”? ——评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后形而上学诠释[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8): 5-17.
- [4] 颜岩, 郑亚岚.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异化及其实质——福克斯技术异化批判理论述评[J/OL].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03-20)[2026-06-12]. <https://link.cnki.net/urlid/45.1066.C.20260320.1044.004>.
- [5] 孔明安. 生命政治视域中的资本权力问题新探——兼论数智时代的生命政治新异化[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5): 9-17.
- [6] 陈朦.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22-28.
- [7] FOUCAULT M.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1976[M]. MACEY B(Trans). New York: Picador, 2003.

- [8] 蓝江. 什么是生命政治[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57-67.
- [9] 周治健. 阿甘本论主权政治与未来世界秩序[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29-37, 193.
- [10] 贾淑品, 郑晓燕. 数字资本主义的交往异化批判与消解[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1): 17-25.
- [11] 程芸芸. 数字化时代生命政治学的话语范式转换——韩炳哲精神政治理论论析[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47-53.
- [12] 刘卓红, 郭晓晴. 资本增殖、劳动异化与算法权力——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的三重维度[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85-94.
- [13] 黎庶乐, 郑智元. 人类解放何以转向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改造道德秩序的革命设想”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J]. 学术研究, 2021(12): 41-46, 53.
- [14] 保虎. “真的”与“否定的”: 马克思生命哲学意涵新解[J]. 社会科学论坛, 2023(1): 15-27.
- [15] 林志友, 李盈卓. 资本主义病态社会“人性异化”病症: 弗洛姆的诊断与救治[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6): 38-46.
- [16] 王娜. 平台资本主义的技术哲学透视[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 11-17.
- [17] 蓝江. 数据一流量、平台与数字生态——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1): 106-115.
- [18] 肯内特·利帕尔蒂托, 刘歆. 监控资本主义: 起源、历史与影响[J]. 国外理论动态, 2025(2): 91-100.
- [19] 王宝珠, 陈尧, 王朝科. 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2): 70-81.
- [20] 刘鹏飞. 生物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本质特征与中国策略——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探究[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25-35.
- [21] 蓝江. 空间、时间与生命政治: 价值形式的三次重组——从《资本论》来解读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形式[J]. 学习与探索, 2024(2): 1-9, 185.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乔纳森·克拉里. 24/7: 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M]. 许多, 沈清,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 [24] 马乔恩.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批判[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 11-21.
- [25]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26] 赵靖, 王延川. 数字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逻辑、现实样态及治理路径[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5(8): 30-38.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8] 胡博成. 《资本论》的空间范畴及其社会关系向度[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3): 31-38.
- [29]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M]. 关玉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1] 李谧. 数字劳动还是数字消费: 对数字劳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辨正[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88-100.
- [32] 白虎. 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嬗变及其反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J]. 学术研究, 2025(1): 42-47.
- [33] 胡博成, 李轶. 论数字资本主义生命情感的焦土化症候、本质澄明及应对理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3): 121-127.
- [34] 胡博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向度及方法论意蕴研究——基于“要资本, 不要资本主义”的视角[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27-37.
- [35] 陈咏媛. 数字时代人的现代化困境及破解路径[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9): 57-69.
- [36] 胡博成, 李盼盼.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演进逻辑及本质澄明[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6): 96-106.
- [37] 申卫星. 数据产权: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J]. 中国法律评论, 2023(6): 125-137.
- [38] 胡博成, 朱忆天.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共同富裕向度及世界意义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267-277.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7(21):3-28.

A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 of the Alien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Zhu Yitian Qin Ruicong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apital logic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production paradigm and lifestyle of modern society, giving rise to new forms of life alienation. Time, space, and subjectivity provide crucial analytical dimens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life alienation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clearly revealing the comprehensive domination of human life by capital. In terms of time, capital leverages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blu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daily life, incorporating individuals' entire lifetimes into the value-creation chain. Spatially, the pervasive presence of digital platforms reconstructs individual living spaces as potential labor sites, expanding the spatial reach of capital. Regarding subjectivity, capital employs algorithms to render individuals computable, intensifying life alienation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The marriage betwee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not only reduces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o a tool for capital accumulation but also reduces human life to calculable, predictable, and controllable productive elements, subordinating individual life logic to the imperatives of capital expansion. Therefore, it is urgently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life logic through the len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enetrating the apparent neutral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uncover its underlying essence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At the same time, socialist institutions must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capital, facilitating a transition from capital logic to labor logic, and ultimately overcoming the total alienation of life through genuine communalism.

Key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life alienation; algorithmic governance; digital labor;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左福生]